



肯向敌人招供。”晚饭间，当记者聊起同样的话题，快要和子女有“话题沟”的父母似乎找到倾诉的机会，兴奋地谈起久远但却鲜活的往事，仿佛他们的青春和激情又被唤醒。

……

面对记者拿来的“田野观察”，长期从事朝鲜半岛及东北亚问题研究的吉林大学教授郭锐只回了一句话：“中朝传统友谊，用物质无法衡量。”

共产主义同路人

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国事访问，在朝鲜《劳动新闻》上发表的署名文章里，习主席深情地写道：“长

期以来，在中朝两党坚强领导下，不论是在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还是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两国人民都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结下了深厚友情，可以说是‘历久弥坚金不换’。”

在郭锐看来，中朝传统友谊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党际交往始终是关键所在，并发挥着价值引领、舵手领航的作用，“这是历史形成的特殊性，它在当前的政治中都是鲜活的和可取的，塑造了我们的政治思维乃至文化取向”。

现当代的中朝关系中，1919年爆发的“三一运动”是个重要节点。以和平请愿寻求独立的朝鲜人遭到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众多爱国者流亡中国。在云集朝鲜精英最多的上海，共产主义思想取得传播优势，这一过程恰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吻合。“那个时候，朝鲜爱国团体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义烈运动，靠个人或小规模组织开展抵抗，以自我牺牲的刺杀行为消灭朝鲜民族敌人。”郭锐具体解释，所谓“义烈”就是指义士和烈士，朝鲜先进分子渴望用战斗显示存在，但神圣事业却毫无进展，“没有先进思想领导，路径问题就无法解决”。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进入高潮，中华大地开启大革命浪潮，受此影响，大批朝鲜人犹如获得新生，意识到自己的祖国和中国一样需要彻底

解放，必须凝聚全民族力量，才能赢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而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是灿烂的灯塔。一时间，朝鲜和其他亚洲被殖民国家青年传诵着充满热血的口号：“到黄埔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26年北伐战争启动时，数百名朝鲜青年参加国民革命军或留校任教，他们普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上海档案馆馆员李红介绍，朝鲜籍同志在红军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不少人曾在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等高等军事学府受过训，有较高作战素养和阶级觉悟，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聂荣臻元帅曾记得，当年打下漳州时曾缴获飞机，当他乘该机飞回“红色首都”瑞金时，驾驶员就是一位朝鲜人。

长征开始时，红军队伍中有30余名朝鲜革命者，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武亭和毕士悌。前者早年是奉系张作霖欣赏的金牌炮兵中校，可他放着高官厚禄不要，1925年加入中共，投身革命，1935年长征途中，党中央一度失去与红军各军团的联系，随红三军团行军的毛泽东要恢复与红一军团的联系，执行送电码任务的就是武亭。至于毕士悌，是全家在祖国“三一运动”中遇害后流亡到中国，以一腔热血投身黄埔军校，并在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影响下秘密加入中共。长征途中，身为红军干部团参谋长的毕士悌总是身先士卒，从四渡赤水到抢渡金沙

中朝传统友谊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党际交往始终是关键所在，并发挥着价值引领、舵手领航的作用，“这是历史形成的特殊性，它在当前的政治中都是鲜活的和可取的，塑造了我们的政治思维乃至文化取向”。